

郑家治 李咏梅 著

明清巴蜀诗学研究

上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明清巴蜀诗学研究

MING QING BA SHU SHI XUE YAN JIU

郑家治 李咏梅 著



四川出版集团 • 巴蜀书社

“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

——丛书序言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文化资源丰富多彩。在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中，巴蜀文化是最具历史渊源与影响的地方文化奇葩。自古蜀国开始，四川（包括未划分为独立行政区时的重庆市，即习惯上所谓巴蜀）就诞生了极其灿烂辉煌的古文化，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资源一直保存延续到今日，其丰富程度是全国很多地方所难以比拟的。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不同地方的人，因其不同的生活历史，而形成了在内容与性质方面相互区别的区域文化；每一区域文化，在其内在特质方面，均具有所形成的特殊的具体生活历史。因此文化资源的概念也很大。从共时性角度看，它包括物质文化资源，即人的内在精神的物化形态，如水利建筑旅游等产业资源、文物资源、人口资源等；精神文化资源，主要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信仰、道德、习俗及行为方式等，以及以典籍形式存在的资源。从历时性角度看，它包括历史文化资源与现实文化资源。从研究层次看，它包括文化素材资源与文化理论资源。我们既要保护与开发物质文化资源，更要保护与开发精神文化资源。因为文化是人的文化，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精神文化既是文化的核心，本身需要保护与开发，而且它又是

物质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内在动力，舍此则物质文化不可能得到保护与开发。既要保护与开发现实文化资源，也要保护与开发历史文化资源。因为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有其自身的演变传承过程与规律，其中有一些思想观念、伦理道德长期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与价值标准，成为现实文化的基础。既要注意文化素材资源的收集整理，也要注重文化理论的探讨与提高。因为没有文化素材资源的收集整理便难以进行文化理论的探讨与提高，而不进行文化理论的探讨与提高，则文化素材资源的收集整理就失去了意义。

在四川省教育厅及有关专家的支持帮助下，四川省教育厅重点社科研究基地“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于2006年获准成立，这是四川文化界及学术界的一件大好事。研究中心进行研究的宗旨是直接或者间接地为保护与开发四川地方文化资源服务。保护是前提，保护必须与整合相结合，整合保护的目的是开发与利用，而研究则是整合保护开发利用的前提。研究的原则是理论研究与实际考察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相结合，传统研究方法与新研究方法相结合，直接研究与间接研究相结合，地方文化研究与全国主流文化研究乃至世界文化研究相结合，追求研究的共享性、实效性、因地制宜性，为四川文化经济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谋。

在有关领导、专家及出版社的支持帮助下，“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丛书得以出版发行。本丛书既注意文化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更重视文化理论的探讨；既注意文化现实的研究，更重视文化历史的发掘与研究；既注意精神文化的研究，也重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结合研究；既欢迎老一辈专家的大作，更欢迎年轻学者的新见。

研究中心尚属初创，丛书也刚刚开始编辑出版，先期出版的几

部多是中青年学者有关文学及历史的著作，且不一定成熟。未来任重道远，但请相信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豪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研究中心衷心地希望全川乃至全国的新老专家学者多多支持，从传统文史哲研究起步，向文化的各个方面拓展，设立新专题，产生新成果，共同来浇灌培育这棵幼苗，使四川的文化资源得到更好的保护与开发，在灿烂辉煌的 20 世纪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以无愧于更加伟大的新世纪。

四川省教育厅

“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2006 年 9 月

巴蜀代有才人出

——序《明清巴蜀诗学研究》

郑家治先生送来新著《明清巴蜀诗学研究》。据我所知，郑家治先生近年来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用功甚勤，成果颇丰，已发表与中国古代诗学相关的论文二十余篇，其中一些论文发幽探微，多所触及古代诗学之重大问题，不乏填补研究空白之作，一些论述为国内学界同仁和报刊征引，为《中国文学年鉴》所收录，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此外，家治先生的近著《古代诗歌史论》（2003年，巴蜀书社）独辟蹊径，从中国古代诗歌的美学意蕴及体式入手，探究古代诗学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力图打通古今，联系中外，颇有建树。

现在我手里的这部约八十余万字的《明清巴蜀诗学研究》，是家治先生积多年苦心研究的力作。拜读之后，深感颇多受启发之处；掩卷之余，感到本书至少有以下数处值得称道：

一是体例明晰。本书引论部分纵向考察论述巴蜀古代诗学，论述巴蜀文人自汉代司马相如、唐代陈子昂、李白、宋代苏轼、王灼对明清巴蜀诗人及诗学所产生的影响，继而在主体部分中以个案的形式研究明清巴蜀的重要诗学家及诗学论著。两部分合在一起，构成了一部巴蜀古代诗学的通论；同时，又注意到了横向联系，深入考察论述明清巴蜀诗学与同期全国诗学的异同。纵向、横向相互交

织，以个案研究为主，以通论为辅，而又顾及对现代诗学及文化影响的结构体系，可谓体例明晰，重点突出，纲目井然而又纲举目张，一编在手，古代巴蜀诗学之全貌尽现眼前。

二是视角独特。本书概述的引论部分评述了明代以前的巴蜀诗学，意在追踪明清巴蜀诗学之源头。主体部分共六编，对明清诗家，如杨慎、费经虞、彭端淑、李调元、张问陶等的诗学著作，进行了全面研究，把焦点集中在古今诗学的关键领域之上，如诗歌本质论、审美论、创作论、批评鉴赏论、体式论、接受论等方面。余论部分则对整个古代巴蜀诗学进行分期，总结其成就与特点，阐述其对后世的影响。全书注重巴蜀诗学与中国诗学传统的联系，注重诗学与文化的联系，有时也照顾到了中国与外国、古代与现代之间的联系，多角度地进行纵横比较研究，微观宏观结合，既有精彩的论述，又有细致的考辨。

三是具体论述颇多开创性。其大者如安磐、来知德、张佳胤、彭端淑、费经虞、费锡璜、李调元等人的诗学是首见论述，而杨慎、张问陶的诗学虽有人论述，但用如此大的篇幅系统全面而又深入地论述与发掘则不多见。作者对这些很少见诸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及论文的诗论家或立专章论述，或立一编专门论述，创获极多，精彩迭出，读者自可去阅读欣赏，不劳我的絮叨。

至于具体创获的事例，据我初步浏览，印象最深者如下：

第一，阐明了张佳胤是性灵说的开创者。作者考察了张佳胤的有关论述，认为张佳胤提倡“雕拟不施，性灵洞见”，反对吮墨之徒“矜重强闻，驰夸典囿，猎名鬻藻，不因性灵”，赞扬“典富平正，根极性灵，命意准体，往往合辙”之诗，及“天才飙发，襟怀畅逸，景得之而为言，言得之而为韵，不俟订一字之工拙，不模拟故步之短长”之诗，其论述与公安三袁的总纲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是相同的，至少是近似的，其具体内涵则是：一是抒发真情实感，

即真性情；二是作者要有灵气，写作时灵感泉涌；三是重视独创与自然本色，反对模拟。所以张佳胤早于公安三袁三十年提出性灵说，是性灵说的开创者或发轫者。

第二，作者对四库馆臣对《雅伦》的挑剔性批评逐条予以批驳辨析，考证清楚，辩驳有力，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作者进而论定《雅伦》是明代之前巴蜀乃至中国卷帙浩繁的诗学百科全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当作进一步整理与研究。典型者如作者对比了《艺文类聚》与《毛诗正义》的有关文字，发现存留于《艺文类聚》中挚虞的论述意在论述诗歌体式，并强调诗歌当以四言为正，而以五言、七言为俳谐倡乐所用之体，但其所举的例子中没有二言、四言、八言，且有的地方有误。《毛诗正义》的话也从诗句字数的角度在《诗经》中追溯诗体源头，它肯定参考了挚虞的论述，且在论九言诗时注明其参考了挚虞的《流外论》，但却对其进行了匡正、改造与提高。它从一字论到十字，认为“一字则言蹇而不会，故《诗》之见句，少不减二”，增加了四言例句，补充了八言体及例句，匡正了挚虞认为“涧酌彼行潦挹彼注兹”是九言句之说。作者的结论是：《毛诗正义》之说比挚虞之说更为全面合理，也证明了费经虞引用古人之论不惟古是崇，而是根据编撰宗旨而有所取舍，而且取舍得当。反之，则证明了四库馆臣有惟古是崇与有意挑剔的毛病。

第三，考察张问陶与袁枚的交往诗文，否定张氏是性灵派信徒之说。现在通行的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都认为张问陶是性灵说的信徒，但作者详细考辨了张、袁二人相互交往的诗文之后，认为袁枚只是赞扬张氏才大，《随园诗话》所记录、奖掖的也不是张氏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张氏也很少论及并肯定袁枚的诗歌、诗论，他赞赏的是袁枚的风流人生，所谓“山林奇富贵，花月艳神仙”；对袁枚的盖棺论定是“眼空天海诗为戏，梦绕烟花死未休”，而坚决否定着意学袁的主张，所谓“汉魏晋唐犹不学，谁能有意学随园”；晚年还严厉

批评后期性灵派，所谓“也能严重也轻清”，“空灵不是小聪明”。作者认为张问陶一生诗学三变，在刚刚写出《论文八首》与《论诗十二绝句》后不久即公开声称“谁能有意学随园”，还提出了“关心在时务，下笔惟天真”的创作纲领，晚年又提出了“凭栏早醒繁华梦，点笔难删讽谕诗”及“也能严重也轻清”的观点，是“独立乾嘉一诗豪”。这些论述论据充分，论证严密，可称独得之见。

第四，论定张问陶主要受杜甫影响。现在的有关论著及论文都不提及杜甫对张问陶的影响，作者详细考察，统计出《船山诗草》涉及袁枚的诗歌计6题15首，其中《甲寅十一月寄贺袁简斋先生乙卯三月二十日八十寿》8首，论及李白者约十处，苏轼者约七处，但张问陶在诗歌中引用化用杜甫的诗歌、诗句及意象的很多，至少不下一百处，是其引用化用最多者，直接论及杜甫及杜诗的至少有四十条，间接者也不少。张氏的诗歌多描写纪录时事、表现战乱、同情百姓、揭露盛世丑态与弊病的诗歌，即他自己所谓的“凭栏早醒繁华梦，点笔难删讽谕诗”，以及大量咏怀诗怀古诗，这些诗歌不仅数量多，而且感慨深沉，描写真切，议论纵横，风格豪放大气，沉郁顿挫，在题材、体裁、风格上与杜诗相似。在诗学方面，他高度赞扬杜甫的人格、个性和思想，以之自况，并同情其遭遇，还全面、具体地评价杜甫的诗歌，赞同并生发其诗学主张，其具体表现是：思想上是“凭栏早醒繁华梦，点笔难删讽谕诗”，体裁上是长于五七言律诗，题材上是写时事，风格上是“也能严重也轻清”，创作态度及方法上是“九转金丹铸始成”，其中后期诗歌创作及诗学的总纲“关心在时务，下笔唯天真”也主要是继承杜甫，“关心在时务”自不必说，而“下笔唯天真”也来自杜甫，因为他说过杜诗也是“天真协古风”。因此张氏与杜甫的渊源最深。

第五是余论部分，非常大气精彩。作者将巴蜀诗学划分为萌生期——汉唐时期、发展繁盛期——两宋时期、专门化时期——元明

清时期。作者总结了巴蜀诗学的巨大成就，认为巴蜀诗学创造了多个第一，足以标炳史册，还阐述了巴蜀诗学的特点：一是多是诗人作家之论，很少专门文论家、诗论家之论；二是多产生于盛世，是巴蜀文化与中原主流文化交融的结晶；三是没有门户之见，很少偏颇之论；四是在基本理论上有一以贯之的观点与特点。作者认为巴蜀诗学的繁盛与其特点形成的原因一是受特殊地域及经济影响，二是受深厚的文化文学传统及积累的影响，三是受时代发展——开放与交流的影响，包括移民的影响。作者还勾画出巴蜀古代的诗学呈现出由汉代至宋代的逐渐发展繁盛，明清时期虽然专门化，但其影响则逐渐降低的发展变化曲线，阐述了这种发展变化的原因。最后又延伸到近现代，认为20世纪巴蜀文学、诗学及文化却突然辉煌而至于极点，不仅远远超越元明清三代，也超越了汉唐宋三代，其根本原因是受西风东渐之时代大潮的巨大影响，是与世界文化及文学接轨的结晶。

另外，作者在资料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夜以继日地研读写作，参考并圈点了上千页的元典，进行了必要的点校考证，所引文献尽量落实原始出处，显示了较为深厚的小学及文献学功底，虽非“文章不写一字空”，但为学术而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值得称道。

“诗圣”杜甫有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家治先生积多年学养，发于一朝。虽未敢言大，却也孜孜以求，精神甚为可嘉。古代巴蜀地域广大，文化积累深厚，尤其是以诗歌及诗学著称于华夏，不仅处于全国各大文化区的前列，就是放在世界文学及诗学的行列里，也丝毫不逊色于各大文明古国，实在是一个值得深入钻探的富矿。笔者深望中国古代文学与诗学研究者及中外比较文学研究者共同努力，携手并进，将巴蜀诗学及中国诗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境地。

阎 嘉

2007年冬序于四川大学

自序

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算来也有十多年了，断断续续写了二三十篇论文，出版了《古代诗歌史论》，但很少文章专门研究巴蜀诗歌及诗学。

因为蜀学研究中心的建立，我也接触巴蜀文人的诗歌与诗学，久之便发现一个问题，即汉、唐、宋三代巴蜀诗论不多而研究却较多，明清两代诗论很多而研究却偏少。汉、唐、宋三代，通行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对巴蜀诗学论述不少，专门的论文论著也不少，影响也很大，著名者如汉代扬雄的赋论，唐代陈子昂、李白的诗论，宋代三苏的诗学观，以及王灼的词学思想。但明清时期巴蜀的诗学很少有人提到，据我所见；只有袁行霈等编著的《中国诗学通论》用了约二十五页的篇幅来论述杨慎的诗学理论与词学理论，郭国平、王远镇的《清代文学批评史》第七章第二节第三点专论了张问陶的诗学观，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等书对张问陶的诗歌及诗学观作了简要的评述。其实巴蜀自汉代开始，就是中国文学及诗歌的重镇及中心之一，相应其文论及诗学也很发达。汉、唐、宋三代固然出过不少大家、名家，如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及三苏等，元、明、清三代也未曾中断。据初步统计，明代有诗文集传世的文人达一百八十余人，清代则有五百七十余人，

诗论、词论专著及论文则远远超过唐宋，明代有近十家，清代则有十多家，其中不乏卓有建树者，除曾被评述的杨慎与张问陶之外，其余如明代的安磐、张佳胤、来知德，清代的费经虞、费锡璜、彭端叔、李调元等都可称为诗学名家。

鉴于这种现象，笔者便萌生了较为系统地研究明清巴蜀诗学的念头，甚至想写一部“巴蜀诗学通论”，于是就产生了这部书。本书的目的在于突破现在学界认为明清巴蜀及西部无诗论及诗学的观点，改变有关文学史及文论、诗论不给明清巴蜀诗学以应有关关注的局面；证明明清巴蜀的诗论是丰富的、系统的、有理论深度的，尤其是杨慎、费经虞、彭端叔、李调元、张问陶等人，他们在诗歌本质论、审美论、创作论、体式论、价值论、发展论及诗歌历史观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也具有突出的地域性。如杨慎诗论博大精深，反对复古模拟、倾心六朝与初唐、主情尚真、重在独创、博采唐宋，崇尚含蓄蕴藉与天然清新，费经虞的《雅伦》是巴蜀诗学的百科全书，也是当时中国诗学的第一巨著，张问陶的诗学先宗性灵派而中年以后又自成一家，所谓“关心在时务，下笔惟天真”，“也能严重也轻清”，“凭栏早醒繁华梦，点笔难删讽谕诗”，诗学纲领三次变化，继承发展了杜甫、李白、苏轼的诗风与诗学，追求气骨与气势，崇尚空灵与沉郁。这些诗论及诗学对20世纪巴蜀文化及文学的发展繁荣具有重要影响，对未来巴蜀文化及文学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对未来巴蜀的政治经济发展也具有间接的影响。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名为《明代以前巴蜀诗学简论》，意在梳理明代以前巴蜀诗学的大致发展历史，阐明其主要观点，为明清诗学研究提供参照系；第二部分以时间为序对巴蜀明清诗人及诗论家进行个案研究，其重点是杨慎、费经虞、彭端叔、李调元、张问陶等人，是全书的重点；第三部分则对明清巴蜀诗学及整个古代

巴蜀诗学产生的原因及特点，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行研究，力图打通古代诗学诗歌与现代诗学诗歌的联系。因为本书的重点是研究明清巴蜀的诗学，而对明代以前的诗学则只是简论，所以准确的定位应当是《明清巴蜀诗学研究》；又因为本书梳理并论述了中国古代巴蜀的诗学，所以也可以算作一部《古代巴蜀诗学通论》。

这里要说明一下诗学这个概念。现在流行的“诗学”多指文艺理论，是从外国传进来的专用名词，朱光潜先生翻译亚里士多德的《TERIOETTIKES》，书名就叫“诗学”，杜国清先生翻译刘若愚先生的《The Art of Chinese Poetre》，也译作《中国诗学》。但中国的“诗”原来专指《诗三百》而言，如此则诗学当是“诗经学”。后来“诗”成为一种文体名称，包括古体诗与近体诗，后起的词被称为“诗余”，也属于“诗”的范围，如此则诗学当是“诗歌学”或者“诗词学”。元代盛行的散曲与词一样是入乐的讲究格律的长短句歌词，按理也当属于“诗”的范畴，但因为有关曲的论述很少，且曲还包括剧曲，所以本书便将其排除。本书的诗学，简言之便是关于诗歌（古近体诗与词）的理论与品评的学问，不过因为诗文理论多是相通的，而且外国的“诗学”更包括除诗歌之外的其他文艺理论，所以本书的诗学便以诗歌理论与品评为主，偶尔也兼及一些散文理论，也就是通行的所谓“文论”。但因为主要论的是诗词，而且为了使名字时髦好听，也为了融合中外，所以还是叫诗学。

信笔写来，不知不觉就有约八十万字，算得上是“大作”了。然而因为著者学识浅陋，而且资料非常缺乏，尤其是清代中期以后的别集孤本很难找，所以本书的遗漏及缺点必然不少。又因为写作时间很短，锤炼不够，所以自觉重复的地方很多，尤其是引用的原文往往一文多见，不过这也避免了断章取义之弊，读者还尽可自己去理解。

杜甫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学术研究不易，精深系

统更难。笔者虽然翻阅了不少资料，圈点了总数达千页的元典，也参考了不少前人及时贤的著作与论文，但离精深系统还很远。就算作是自不量力的垦辟吧，有关的更系统精深的研究只好留待来日或者他人了。是为序。

郑家治

2007年9月于西华大学之醉醒斋

目 录

巴蜀代有才人出——序《明清巴蜀诗学研究》	阎 嘉 (1)
自 序	(1)
引论 明代以前巴蜀诗学简论	(1)
第一章 汉代的辞赋家及其诗学理论	(2)
一 汉赋第一人司马相如的辞赋与“作赋之迹”、“赋家之心”	(3)
二 王褒的辞赋与“赋体物而浏亮”	(5)
三 学者型辞赋大家扬雄的辞赋与儒家文论	(7)
第二章 唐、五代的诗学理论	(15)
一 陈子昂以复古为革新之风骨兴寄论	(16)
二 诗仙李白的诗歌及诗学思想	(20)
三 古代第一篇词论——欧阳炯的《花间集序》	(24)
第三章 宋元时期的诗学词学理论	(28)
一 宋初田锡重性情重个性的诗论	(29)
二 苏舜钦重性情及劲健之美的诗论	(32)
三 苏洵的诗文创作论	(35)
四 苏辙重视养气的诗文理论	(38)

五	宋代文学第一人——苏轼的诗词文论	(42)
六	中国第一部词论——王灼的《碧鸡漫志》	(60)
七	南宋时期诗人理学家的诗文理论	(69)
八	元代文宗虞集的正统儒家正统诗论	(73)
第一编 明代前中期一般诗学家研究		(80)
第一章	明代巴蜀第一部诗话——安磐《颐山诗话》研究	(81)
一	安磐的诗歌本质论	(83)
二	安磐的诗歌美学论	(85)
三	安磐的诗歌创作论	(90)
第二章	谢东山、熊过、赵贞吉的诗学研究	(98)
一	谢东山诗学简说	(98)
二	熊过诗话研究	(100)
三	赵贞吉诗学研究	(104)
第三章	心学家来知德的诗学思想研究	(108)
一	来知德的诗歌本质论	(108)
二	来知德的诗歌美学论	(111)
三	来知德的诗歌创作论	(115)
四	来知德的诗歌接受论	(122)
第四章	性灵派的先驱——张佳胤的诗学研究	(123)
一	张佳胤的诗歌本质论	(124)
二	张佳胤提倡性灵说	(133)
三	张佳胤的诗歌美学论	(137)
四	张佳胤的诗歌创作论	(145)
第二编 明代博学第一人——杨慎的诗学研究		(155)

第一章 杨慎的诗歌本质论	(157)
一 从不同角度直接论述诗歌的本质	(157)
二 在论述才学关系时论及诗歌本质	(160)
三 在批评宋人“诗史”观时论述诗歌本质	(162)
四 在论诗歌构思创作时论述诗歌本质	(164)
第二章 杨慎的诗歌美学论	(165)
一 杨慎诗歌美学思想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	(166)
二 主情求真,以表现真情为美	(169)
三 继承风雅,提倡温柔敦厚之美	(176)
四 倾心六朝初唐,提倡含蓄蕴藉天然清新之美	(182)
五 博采众长,提出了多种相对的美学范畴	(199)
第三章 杨慎的诗歌创作论	(230)
一 强调独创,认为“同能不如独胜”	(230)
二 重视独创,而又不废学习与读书	(234)
三 论述创作的基本原则	(243)
四 具体论述创作的各个方面	(248)
第四章 杨慎的诗歌体式论	(263)
一 杨慎诗歌体式论立论的基础较为坚实	(263)
二 从诗句长短的角度对诗歌体式进行纵向考察	(264)
三 注意考察论述较少见的古体诗歌体式	(267)
四 探索五言律诗的起源	(269)
五 探索七言律诗与绝句的起源	(271)
第五章 杨慎词学研究	(274)
一 杨慎的词作及词学著作简述	(275)
二 杨慎的词体渊源论	(280)
三 杨慎的词本质论初探	(298)
四 杨慎的百花齐放美学论	(305)